

第1版
2012年2月 总第50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 世界文化論壇

##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007  
Claremont, CA 91711-8007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 怀特海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思维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格里芬博士 柯进华 译

**一、怀特海哲学支持生态思维**  
现代思维通常认为只有人类(或许也包括其它高等哺乳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即为了自己的价值——而怀特海则把内在价值赋予所有真正的个体。怀特海抱怨道, 现代性——由于其对人和其他生物的二分观——造成了“忽视在任何重要决定中都必须考虑的环境的内在价值的习惯”。他说: “任何事物都有属于其自身的价值……通过对这一构成现实的特性的思量, 可以产生道德的概念”。我们无权损坏作为宇宙基本要素的价值体验。他还说道: “我们对于现实性的满足是一种价值的实现, 无论好坏。它是一种价值体验。它的基本表达方式是: 小心点, 这儿有关乎紧要的东西!”

**二、自1969年环境保护运动在美国爆发以来, 怀特海思想家们始终处在生态思维的前沿**

大家一致认为, 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尽管发端于1960年代初期, 但引其爆发的是1969年发生于加州圣塔巴巴拉的漏油事件。事件三年后, 后现代哲学家、神学家小约翰·柯布出版了《是否太晚? 一种生态神学》一书。环境伦理期刊的创办人Eugene Hargrove认为, 这是第一本由一位哲学家独立写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柯布在1972年就已经警告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 他告诉他的美国同胞, “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议题是应当适当调整国家事务的优先顺序”。为什么? 柯布写道, 因为“生命自身(在地球上)的存活危在旦夕”。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 柯布出版了更多相关的文章和书, 包括与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 1982)合著的《生命的解放》、与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 1989)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1992年的《可持续性》、与克里福·柯布(Clifford Cobb, 1994)合著的《绿色GDP》、以及1999年的《地球主义者对经济主义的挑战》。

怀特海哲学不仅激发了第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专著的书, 也产生了第二个关于此问题的博士论文: 苏珊·阿姆斯壮(Susan Armstrong)1976年在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完成的《非人类的权利: 一个怀特海主义者的研究》。怀特海思想也激发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态写作, 包括著名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查尔斯·伯奇, 他称怀特海的世界观为“后现代生态世界观”。

**三、作为最早把怀特海哲学称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人,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始终关注生态危机**

1968年我在柯布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开始任教于代顿大学(俄亥俄州代顿市)。在第三年, 我开始教一门关于神学与生态学课。该课程中我写了一篇文章“怀特海对一种自然神学的贡献”, 该文正式发表于1972年。接下来的三年, 我又发表了四篇生态论文, 题目分别是“我的新愿景”和“创造的过程神学”等。同一时期, 我出版了第一本书《过程哲学论》, 书中我写道“基督教现实图景的超越概念化……强烈地支持对社会的强调。”但是, “基督教所对‘社会福音’的强调必须变成对‘生态福音’的强调”。

福音”的强调”。1973年我回到克莱蒙帮助柯布成立过程研究中心。在那里一年之后, 我们合写了一本介绍过程神学的书, 其中的两章(共九章)谈及生态话题: “自然的神学”和“全球危机和生存的神学”。我还写过一本关于生态问题的论文集, 但是我愚蠢地把唯一手稿借给一位学者朋友, 最后却有去无回。这是在我们拥有计算机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切都没有电子存档。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我忙于其他事情, 但是在1984年, 我在圣塔巴巴拉度过暑假, 在那里我创办了后现代世界中心, 在那里组织的第一个学术会议产生了两本书《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精神》。这两本书导致了一个决定, 即在圣塔巴巴拉成立一个姐妹中心, 这又带来一个最重要的后果: 把治河和美筠带到了克莱蒙, 他们两人又共同创建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在纽约州立大学(SUNY)出版社主编出版了《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自1998年到2004年, 共出版了32卷。《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精神》是这一系列最早出版的两卷。其他几本书的书名表明了它们的生态性质: 《生态读本》、《地球峰会伦理》和《为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星球的后现代政治》。

**四、尽管我和其他怀特海式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生态危机”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危机, 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众多问题之一。**

在我和法尔克共同主编的《为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星球的后现代政治》中, 我贡献了一篇文章为“愿景、总统和生态危机”的论文。文章一开始说道: “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他自己的活动正威胁到其自身连同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生存。”我还引用《地球现状》的作者的话: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写一本乐观的地球现状, 在其中我们能够报告那些损害人类前途的趋势已经得到扭转。现在看来, 这样的报告在九十年代是无法写了, 很可能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写了。”但是, 在九十年代我写了许多关于其他话题的书, 包括科学和宗教、心灵学、心-物问题和宗教哲学。如何理解我的这一举动? 我和其他怀特海式后现代哲学家, 已经看出如果不能及时逆转地球的生态退化进程人类即将毁灭, 我们怎能这样写作, 好像生态退化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原因在于, 怀特海哲学是一个包罗广泛的世界观, 它提供了一个广泛讨论各种重要话题的基础。作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世界观, 它于导致生态危机的众多现代教条和态度之外提供了另一个选项, 这些现代教条和态度包括物质主义、二元论、新达尔文主义、虚无主义、经济主义和帝国主义。怀特海式后现代思想家们通常都急于运用怀特海的观点和上述信条和态度作斗争。

以我为例, 我试图用我关于心灵学、科学和宗教、心-物问题和宗教哲学的书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990年代, 我还曾经尝试过关于全球化运动的, 外加一本抨击美国帝国主义的, 该书的写作开始于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

最后, 自2003年起, 我开始写关于9.11的书, 那时我认识到官方关于那次袭击的

法是谎言——9.11是一个内部的安排, 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借以打击穆斯林国家的借口。为同这个谎言作斗争, 我已经写了10本书。这看起来好像远离了关于全球变暖问题。事实上, 一些左派评论者已经指责说9.11真相运动转移了人们关于真正重要问题(如全球变暖)的关注。作为回应, 我写道:

“认为9.11是外国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袭击这一说法, 已经成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它同样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全球变暖这类话题转移开, 而这是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关于9.11事件的阴谋论, 是对人们注意力的真正扰乱。”

为解释得更充分, 我又写道: “袭击的一个破坏性后果是把公众和国家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恐怖主义, 因而不再关注我们时代的中心议题——生态危机。首次在历史上, 一个物种, 即我们人类自己, 正在一条如果不加纠正就会把整个地球上的生命置于灭顶之灾的不归路。因此, 我们当下的首要议题, 是人类文明能否学会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随着冷战的结束, 加之因为全球变暖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一问题似乎开始得到它应得的关注。”

但是9.11事件以及官方对事件的叙述, 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到移开, 强迫我们回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考虑到自袭击以来很多宝贵时间已经失去的事实——本来可以用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时间——9.11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这, 这是我的第五点意见是:

相应地, 我指出, 一些怀特海式后现代主义者没有花全部精力直接针对全球变暖问题, 而是放在那些与全球变暖间接相关的问题上, 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 我的第五点意见是:

**五、我们通常叫作“全球变暖”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如果不能全力以赴地对待, 我们人类将称为生态灾难的牺牲品**

前面我引用了1989年出版的《世界现状》的话: “如果我们在九十年代不能(扭转局面)写一本乐观的地球现状, 我们很可能将永远没有机会写了。”他们还写道: “九十年代需要成为‘扭转的十年’。”可是, 九十年代的扭转并未发生, 甚至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也没有发生。

相反, 尽管在某些局部有一些改善, 可是全球变暖仍在继续。变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以至于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到本世纪末地球平均温度可能升高六度, 援引《科学美国人》近期的一篇文章“全球变暖即将变得不可逆转”。

一个全球变暖的迹象是地球三大冰川的融化。例如, 自1990年以来, 格林兰岛冰川每年大约减少48立方英里的冰。

冰川的融化, 连同其它因素在内, 正在导致海平面上升。根据2011年《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 “科学家们现在预期,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到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到6英尺。”

2011年的一篇报告指出, 几英尺的上升“足以淹没许多岛国。”海平面上升还会威胁到许多国家的沿海地区, “大约有1.6亿人口居住在海拔1米或更低的地方”, 因此“即

便是海平面的小幅上升也会极大地影响上百万人。”

对全球变暖的来源最精确的度量是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百分比。在工业革命之前, 大气中二氧化碳占百万分之二百七十五。由美国宇航局詹姆斯·汉森带领的气候科学家们最近确定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最高的安全水平是百万分之三百五十。不幸的是, 1987年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低于安全水平的最后一个年份。现在的水平是百万分之三百九十二。如果地球的二氧化碳水平保持在这个水平, 将会发生“剧烈的气候变化”, 这将带来人类及其它高级动物的灭绝。发表了三百五十这个数字的比尔·麦吉本说: “我们(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超过(百万分之)三百五十这一事实, 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无可救药, 因为超过三百五十并不立即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但是除非我们尽快回到三百五十以下, 否则我们将真的无可救药了”。

近几十年来大气二氧化碳超过安全水平的另一个征兆是北极熊的命运。北极熊成为“第一个因为全球变暖而被加入濒临灭绝物种的行列”。它们所赖以生存的海冰正迅速消失。其后果是: 它们“正在被淹死、饿死”。

相应地, 有很多其它迹象表明, 全球变暖正在趋向一个不可逆转的点。

今年二月, 18个蓝色星球奖——环境保护的诺贝尔奖——得主写的一篇文章被呈递给联合国理事会的该项目。其中的一个得奖者鲍勃·沃森爵士说, 文明正面临“绝对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 因为全球变暖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这引出我的第六点:

**六、相应地, 怀特海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应该开始给予这个问题以特别关注**

我已经指出, 有很多问题值得怀特海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为之发声。但这仅在我们还没有遇到“绝对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下有效, 这个紧急状况威胁到了人类以及其它高等生物的生存。鉴于此紧急状况, 我们怀特海主义者应该优先考虑拯救能够拯救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只应该解决生态危机, 这恐怕走得太远了点儿。但是我们应该把对生态危机和一点成因全球变暖——当作众多事业中最最重要的一个。

当柯布博士在1972年出版《是否太晚?》一书时, 如果政治家们采取措施, 可能还不会太晚。当1989年《地球现状》寄于于一个扭转乾坤的十年的时候, 也可能还不算太晚。但是到了现在, 已经为时过晚, 无法阻止各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然而, 对于阻止导致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灭绝的生态危机, 可能还不算晚。

可是, 即便是这一小小的希望, 也会很难实现。这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在大财阀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 他们除了增长个人财富之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在美国, 这一精英阶层掌控了大众传媒, 使得记者们很难发表不利于他们的报导。例如, 我从英国的《卫报》了解到, 《蓝色星球报告》说我们正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但当我在互联网上查看有多少主流(下转第2版)

### 本期主要内容

怀特海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思维	第1版
超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异化	第1版
儒家思想与自然观	第2版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心灵生态	第2版
做个智慧的企业领袖(下)	第3版
小农场是美丽的	第3版
慢与快	第4版

### 刘宗超博士 喜获“柯布共同福祉奖”

中国著名生态农业专家, 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刘宗超博士日前获“柯布共同福祉奖”。为了表彰刘宗超博士在生态文明研究和生态农业实践方面所做出的出色成就,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于2012年4月27日晚在克莱蒙隆重举行颁奖典礼, 将第五届“柯布共同福祉奖”颁发给刘宗超博士。克莱蒙前市长Peter Yao先生,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 秘书长曾庆华先生,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以及170余位中外嘉宾出席了颁奖晚会。新华社、《国际日报》、《中国日报》、《世界文化论坛》和《山行文化报》, 等中外知名媒体也派记者前来进行采访和报道。

颁奖典礼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凯伦·陶哲森副院长主持, Peter Yao市长, 格里芬博士, 克莱顿教授和王治河博士分别代表嘉宾致辞, 对刘宗超20余年来始终不懈地探索生态文明, 特别是将生态文明理论付诸实践, 大力推广生态农业, 开创了用生态肥料改造土壤的创造性思路的杰出成就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在随后的获奖感言中, 刘宗超博士表示今天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一天。他向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评委会和他的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团队的全体同仁表达了谢忱。同时也向柯布博士表达了敬意。认为他和格里芬所开创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生态文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他同时也向来宾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学派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独特贡献。

此奖由享誉世界的后现代思想家和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设立, 奖励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生态文明和自然共同福祉做出杰出贡献的各国人士。前4届获奖者为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玛丽·塔克、后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先驱安·弗罗伊登伯格、北京地球文化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



右图为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前校长约瑟夫·豪博士(左)代表评委会向刘宗超博士颁发“柯布共同福祉奖”

### 和谐与生态文明: 超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异化

美国佛蒙特大学 弗雷德·马加多夫 教授 郭海鹏 译

首先要说明, 我既非哲学家, 也非中国文化历史的专家。我的背景是农业, 研究的是土壤肥沃和健康, 并由之延伸到生态学与方法在农业和社会中的应用。

在此背景下, 当在人、社会和环境的语境中考虑和谐一概念时, 我的理解是: 和谐指的是所有人和自然环境, 没有剥削, 各尽其能, 各得所需——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基本需求——安然无忧、快乐满足地过着人当过的生活。除此之外, 这一概念还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 以及人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物种之间的和谐。人们需要全面了解, 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对下述状况的了解: 人位于自然之中, 依赖自然而生存——不仅从自然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 而且人们的生活因自然的生物多样性而丰富, 并且为自然的多种循环——如水和营养循环一的平稳、高效运作所保护。

在上述的和谐概念中,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社会的和谐——在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资本主义不能并存。资本主义已存在近500年(约250年的商业资本主义和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 虽然比起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15万年的历史微不足道, 但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謝互动, 是有害和和谐的。这是资本主义基本性质使然, 也是它在正常运作时所促进的各种关系造成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满足人类需求同时保护环境。它只有一个目的和动力, 即资本的无休止的积累, 这最终将导致它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长期的滞胀。资本主义体系有几个基本的性质, 并且它促成几个特殊的性质和关系。下面是资本主义的几个关键方面: 它必须保持增长(否则就会陷入危机之中), 它自身的逻辑和动力驱使它的增长; 它除资本的不断增殖外, 没有其它驱动力; 它通过对“外部经济效果(或副作用)”的创造, 对人类、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和其它物

种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造成破坏。保罗·斯威齐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同自然的关系: “对于自然环境, 资本主义不把它当作受重视和被享受的东西, 而是作为它实现至高无上的赚取利润和资本不断增殖的目的的手段。”

它无视子孙后代的需要耗用不可再生的资源, 好像它们是无穷无尽的, 甚至还滥用可再生资源如海洋的渔业资源和森林; 它在一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制造巨大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

它需要并产生一个劳工大军——人们和经济不稳定地联系在一起, 多数陷于贫困或接近贫困——以满足经济上升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并且在不需要时工人可以轻易地被开除;

它促使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竞争, 导致帝国主义, 并由于对主导地位和资源的争夺而引发战争;

它促进某些特别的有助于人在社会中繁荣, 甚至仅仅是存在的人的个性的发展——如自私、个人主义、竞争、贪婪、剥削他人、消费主义——同时抑制其它一些人的特性的充分表现——如合作、分享、同理心和利他主义; 它导致人的健康的破坏, 因为人们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会失业或害怕失业, 伴随失业而来的是对人的健康的许多长期负面影响;

它导致健康社区的破坏, 因为人们行为和外貌变的更加疏离, 乡土文化被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际资本主义文化所取代。人们变得专注于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取得更多, 对他人的互惠关系依赖越来越少。

需要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关于增长的迫切要求, 因为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主要障碍。无休止的增长意味着不断耗用更多的资源……永无止境——即使我们能找到更高效使用资源的方法。一个经济体如果每年仅增长一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会在72年内翻一番; 如果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 则会在36年内翻一番。如果每年增长3到4个百分点, 则相应地经济可

以在18到4年内翻一番。但是, 我们使用资源的速度已经走出了地球的极限——我们正在情事地耗尽那些不可再生的储备资源, 并在滥用或过度消耗那些理论上是“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在未来的20或30年内世界经济再翻一番, 这只会加快生态和社会的衰败, 导致混乱和毁灭。

因此资本主义所促进的那些过程、关系和结果, 正好是建造一个生态、公正、和谐社会所需的反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观察到, 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意识形态和实践里,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排除在历史之外, 因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的“本质”通过革命的手段, 以一种实际的方式相和谐”。只有这样, 才能重新建立与自然和他们自己的生产的和谐联系。

但是, 很多人看不到资本主义在生态毁灭中扮演的角色。因此, 资本主义中各种生态和社会的对抗和矛盾经常被误诊。有些观察家认为, 问题是由工业社会的崛起带来的。因此他们的观点是, 任何基于或使用工业生产的社会都会有同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另外一些人把对自然资源的无计划开发和对环境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归咎于过多的人口。他们认为, 过多的人口是罪魁祸首, 而解决方法是尽快减少地球人口。一些无关历史的评论者说, 问题是因为人类固有的贪得无厌所造成。除了几个特别的例外, 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无视资本主义的特性和运作, 都不用说对其进行仔细考察了。他们如此的身处其中而不识其庐山真面目, 以致于给资本主义误贴上“市场经济”的标签, 并假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任何其它经济系统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都被完全忽略。一旦采用这样的方法, 其浅薄的分析意味着所得到的“解决方案”通常都是荒谬的。

对任何问题的理性和有用的分析, 都依赖于一个关于问题原因的正确分析和诊断。如果分析偏离实质, 则所得到的“解决方案”大多是无效的。例如, 有人坚持认为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所以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法”是快速降低世界人口。因此, 向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女工发放避孕用品就变成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可是, 那些关注人口过剩的人并不讨论对环境和人们造成损害的经济制度, 也不讨论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不平等的道德和实际问题。

另一个被那些关注人口过剩引起环境问题的人所忽略的方面是, 除了利用资源时缺乏对环境考虑外, 地球上绝大多数环境问题也是由富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据世界银行估计, 世界上人口中最富有的10%使用了约60%的全部资源(因此要对60%的污染负责)。因此, 那些坚持关注不可再生资源 and 污染问题的评论者们看不到他们中的一个主要“解决方法”——在贫穷国家进行生育控制——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需要指出, 穷人也应该享受医疗服务, 包括那些计划生育的家庭。)但是, 人们怎能忽视一个对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如此重大的问题的60%的原因?

虽说资本主义造成了众多上述的特性和关系, 我们必须知道, 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早就存在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 包括战争、对人和自然的剥削、以及生态破坏等。但是, 资本主义加强了这些问题, 并使之系统化, 同时也带来其它负面影响。

与地球和谐共处

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 决定由私人作出, 其依据是资本增殖的多少、个人的贪欲和消费主义, 凭这样的系统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社会关系只会是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的反映……”。层级的阶级结构被固化——包括工

人(蓝领和白领), 小商业主(包括农场主和小工艺生产者), 大型商业机构的经理和老板。工人与经理或老板的关系反映了在工作单位内外财富和权力的不同。老板与工人有不同的利益。老板要尽量最大化利润, 而工人要尽量获得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驱动力, 以及编织在其DNA内部的过程、实践和方法, 很难去改革或修正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或生态文明的目标。资本主义, 究其本质而言, 是不可持续的、反和谐的和反生态的。

没人能预测未来文明的细节。但是, 要想实现生态的和可持续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 一个经济体将需要以满足所有人最基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需求为其唯一目的(这自然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跟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样, 经济需要被浸没在人们的关系之中, 并必须受到人民的控制。

一个生态和和谐的文明, 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和生态健康的社会, 将会有几个基本的特性。在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将会需要停止经济增长。它需要去促进、鼓励和奖励人们的那些积极正向的特性, 如合作、分享、同情心和互惠。它的运作必须尊重和关爱环境——包括本土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有人相信, 大自然有其自身的权利, “地球母亲”应该受到尊重和关爱, 仅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和合乎伦理的。但即便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 创造和保持对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来说最基本的生物和栖息地的多样性和正常功能, 关乎人类和社会的直接利益。为了现在和子孙后代生活得健康、幸福, 人们需要清洁的水、健康和肥沃的土地, 以及对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的使用。退化的生态系统需要被重新产生。人们需要地方来观赏和享受自然世界——公园、森林、沼泽和湖泊。当理解了大自然的美及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之后, 人们会过上一一种更富情感的生(下转第4版)

###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 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 文化廣場, 放眼天下, 美國大觀, 洛城夜話, 企業文化, 思者手記, 過程思維, 綠燈人生, 成功之道, 大師風範, 華人明星榜, 信仰的天空, 名校推薦(廣告), 互動特區, 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 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 特色店(廣告)等。  
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

###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劉笑敢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寶兒 安乐哲

### 《世界文化論壇》報

- 主編: 樊美筠
- 編委: 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 顧問: 葉秀山 叶明 朱德生 周桂钿 乐黛云

## 儒家思想与自然观

[美]耶鲁大学 玛丽·伊芙琳·塔克博士 郭海鹏 译

儒家思想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人文主义传统，关注于人在家庭、社会和政府中的角色和责任。因此，儒家思想基本上被视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伦理或政治思想体系。然而，随着众多儒学典籍英译本的出现，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个狭窄的看法需要被重新审视。儒家思想与过程思想的对话已经为未来的讨论开辟了新的领域。

人们开始认识到，儒家思想不仅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肯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世界观可以描述为一系列同心圆，人位于其中心，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嵌入家庭、社会和政府的一系列圆环之中。《大学》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点。所有这些圆环又都包括在宏大的宇宙之中。因此，人存在的丰富背景是“天地万物”，那个多样而丰富的自然。

## 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 孔子：外向修德

儒家传统公认的奠基者是至圣先师孔子（前551—479年），他的名字被耶稣会的传教士拉丁化为 Confucius。生于一个社会快速变化的动荡年代，孔子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个人和国家的克己复礼重建社会和政治秩序。孔子的教导主要记录在他与弟子的对话录《论语》当中。他强调德行的培养，特别是“仁”与“礼”的实践（孝也包含其中）。君子是仁与礼的具体体现，特别表现在五伦关系之中：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建立社会秩序，人们必须先从家庭内的和谐、孝亲和礼法开始。然后，像同心圆那样，将德行的效果向外扩充到社会。类似的，如果统治者是有德的明君，就会像石子投入水中一样产生涟漪效果，一层一层地向外扩充至社会和自然。

在古典儒家世界观的核心，是对仁

和礼的深刻的承诺。这两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个精神信仰的路径。通过礼，从行孝开始，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祖先乃至整个自然投以回报。通过仁，人将此敏感性扩大到其他人，乃至所有生物。在此过程中，人成为更加完整的人。孝的关系被认为是实践仁的根源。这些关系从一个人的家庭和祖先开始，扩充到他人的家庭，再到宇宙自然大家庭。按此方法，这些生联接提供供给一个人互相连接的精神信仰路径的树根、树干和枝叶。人、自然和宇宙在孝与亲的涌流中相互结合。从祖先到子孙后代的联系中，代际连接和伦理纽带得以建立。尊敬和互惠被认为是从对父母和祖先那里得到的生命礼物的自然回报。同样的，将天与地当成是所有生命的伟大父母，人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生物，以及自己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这可视作为一种从个人向外辐射的可持续性模型。

## 孟子：自我的养成和自然

孔子的思想进一步为孟子（前372—289年）和荀子（前313—238年）所发展，他们二人就人性本善或本恶展开争论。孟子的性善论为大多数儒家思想家认可，这为儒家的教育哲学和政治理论增添了一份乐观主义色彩。这也对儒家传统的精神信仰方面产生了影响，因为自我教养被认为是内在良知的发现。孟子提供了一种对自己实现过程的理解。他识别出人性的内在善根，并建议了将其培养扩充以达到德行的完全实现的方法。运用前面关于自然世界的类比，个体为家庭和社会的自我修养，可以扩充到更大的范围，把自然环境也包括在内。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类似于植物养成一样的路径。除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教导，孟子还提倡以仁政来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他的政治思想包括适当的农耕措施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特别地，他极力主张统治者应该照顾人民的基本需求，遵循义而非利的原则来统治。

## 荀子：礼的关系和宇宙

荀子重点强调礼的实践作为一种个人修养手段的重要性。他注意到人的欲望需要得到满足，以及象礼与悲这样的情绪应该得以适度表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重要的婚嫁娶的仪式中，礼提供这种情感表达的形式。而且，因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他比较重视通过教育来塑造人性向善。最后，他发展出一种天、地、人三才相参相和的思想，这也受到后来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他写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这里的天被理解为主宰宇宙的指导性力量，地是人在其中生长和繁盛的自然世界。

## 朱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儒家思想在公元11~12世纪经过对早期理论的综合得到进一步繁荣，称为新儒家复兴。新儒家的集大成者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从儒家早期经典中挑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推崇为包含儒家思想精华的经典。1315年，《四书》连同朱熹之所做的注解，成为中国科举制度中士人考试的主要立论根据。科举制度延续600余年，直到1905年才被取消，其目的是为统治中国的庞大政府官僚机构提供受过教育的、有道德的官员。每一个政府的未来官员都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基于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此，新儒家对教育、农业、国土和社会价值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自然、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观点从新儒家重视以人对自然的养护和关爱来履行其在天地人三才关系中的职责而得到。

朱熹对新儒家思想的综合记录在他

著名的《近思录》一书中。在书中，朱熹构建了一个入世的精神信仰体系，其基础是在宇宙论导向、伦理和礼仪的实践、学术反思和政治参与之间达到一种微妙平衡的。其目的是以外向的调查与自然界动态变化相一致来平衡内在的修养（即格物致知）。朱熹确信这些变化是宇宙和个人的转变之源。因此新儒家的精神修炼涉及培养人的德性以达到其与宇宙间更大的变化模式的和谐。每一种德行都有其宇宙论成分。例如，仁的中心德行被视为是个人和宇宙繁荣生长的源泉。通过对仁的实践，人可以影响在自我、社会和宇宙中事物的转化。这样做的时候，人同现实的深层次的一致性表现为与天地万物的合一。如《中庸》所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儒家的关系和自然：

## 身体力行的可持续性

从先秦儒家典籍到新儒家著作，都强调自然作为一个关系的整体而存在，人和宇宙在其中繁衍生息。事实上，儒家思想认为是自然的节奏支持着生命的生物性需求和社文化文表现。对儒家而言，生命的生理维度依赖于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连续体的自然。自然中的万物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更重要的是，儒家认为自然是动态的、转化的。这些观点在《易经》和《四书》中，尤其是在《孟子》、《中庸》和《大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并在宋明新儒家传统中得到充分阐发。在这一传统中，自然有其内在的统一，即它有一个基本的存在论的本源（太极）。它具有固定模式的转化过程（阴阳），通过五行和万物的互动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自然是物质力量（气）的动态流动。

## 自然的道德：肯定变化

对于儒家，人是“天人合一”的

存在，而非人类中心的个体。人被视为与自然的大宇宙相关的小宇宙。在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人与天地构成三才的比喻中。这些关系在汉代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元素、方向、颜色、季节和德行相互对应、关联的复杂系统。这种把自然的模式和人类社会的节奏相联系的需要，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它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基础，按照这一观点，人同相互关联的天和地一起促成和谐的社会。这一自我、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共鸣不断见于许多儒家典籍之中，在艺术和建筑中也可以清晰看到。

对儒家而言，自然不仅是内在有价值的，在道德上它也是善的。因此，自然体现了对万物的典范标准，这显然不是以人类中心的观点而判断的。儒家的世界观中不存在事实和价值的二分，因为自然被视为是价值的内在来源。有一个经常被新儒家谈到的术语是“生生”，它反映生命本身的不断更新和繁衍。在此意义上，生命的动态转化被视为是生长、成熟、收获和丰裕周而复始的不断再生。这反映了自然、人的生命和人类社会中的荣衰的自然过程。因此变化被理解为是一种人们应该与之和谐互动而非躲避的动态力量。

在此语境下，儒家并不认为等级一定不可避免地带来主导和专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其价值，但是却不相等。自然和社会中的每一事物都有其合适的角色和位置，因而必须被相应地对待。以人类为目的的对自然的利用必须不仅承认自然中万物的内在价值，也承认其在环境中更大背景的关系中的价值。每一事物都并不与其它事物简单相等，自然中互相关联的各部分根据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人类和其它物种具有不同的适当角色。对儒家，等级制度是万物体现自身功能的必要途径。这样，在此传统中，没有哪个个体物种在对自然的关系中有特权地位。相

反，自然的过程及其连续的变化逻辑（阴阳）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更优先的规范标准。

## 人类社会和政府：可持续性的基础

儒家清醒地意识到自然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如不悉心照料会导致自然失衡。《孟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应推行基于对自然资源和家庭实践的适当管理的仁政。而且，儒家典籍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及不要滥伐树木或无必要地狩猎。可是，人类社会、政府和文化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要利用自然来建筑房屋、生产或是治理。在此意义上，儒家或许可以视为是实用社会环保主义者（有别于深度环保主义者），他们认可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建立人类教育和政治机构的需要。但是对儒家，很清楚的是，人类的文化价值和实践建筑于自然和它的恩惠之上，因而人类依赖于自然的恩惠。此外，儒家社会的农业基础从来都被认为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福利是很重要的。人类通过生活在自然之内而得以繁盛，受自然的美的洗礼而振作精神，依自然的四季轮替得以恢复，并为自然的律律所充实。对儒家而言，人类的繁荣依赖于对自然的多样性和丰饶物产的哺育，违背自然过程是自我毁灭之举。人的德行的提高意味着控制一个人的欲望，不去干扰自然，而是与伟大的自然之道和谐相处。这样“人心”才能得以扩充，而与“道心”相合。

简而言之，对儒家，与自然的和谐是基本的；人的自我实现通过与自然的关系而同自然的和谐而达到。儒家思想中伟大的天、地、人三才概念强调，人只有通过与天地的关系才能达到人性的完整实现。这成为一个宇宙论伦理关系系统的基础，并可应用于家庭、社会、政治和自然各领域之中。这就是儒家可持续性的关系基础。

##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心灵生态

——一个过程哲学的视角

【美】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克莱顿 教授 梁鹏 译

（上接第1版）报纸、杂志和电视网络转载这一报导时，却发现英文媒体里只有《纽约时报》、《伦敦时报》转载，其他媒体如NBC、CNN或BBC都未转载。

同样地，这些精英们，非但不支持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努力降低二氧化碳水平至百分之三十五，甚至反对将其维护在当前水平的任何严肃的努力。

相应地，我们许多西方人对我们的政府和主流媒体都不报太多期望。寄望于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政府——如中国——还更加现实，他们已经表现出对公共福祉的兴趣。

在2015年，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将主办第十届怀特海大会。著名生态运动领袖比尔·吉本（Bill McKibben）等人会被特邀演讲，这次大会将会向世界公示过程研究中心已将过程生态危机作为我们时代的中心议题。

## 第6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克莱蒙顺利召开

4月27—28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70余位中国生态文明专家和40余位北美学者，云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全美著名生态学家克莱蒙（Claremont）大学城，参加第6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论坛的主要参加者有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柯布（John B. Cobb, Jr.）院长，格里芬副院长，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克莱顿教授，美国著名儒学家，耶鲁大学塔克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

（上接第4版）界堵城”之称。官员把刺激汽车消费，当成增加GDP的法宝，GDP是跟官位直接挂钩的。汽车业大跃进，自主品牌的利润率却极低，某知名自主品牌生产一辆车的利润只有132元，不如卖一件T恤衫。

年轻人适应了量化生活。数字管理之下，有的同仁成了高产写手，一天几篇大稿子，全是上网一扒就完事。谁还为写2000字去采访半个月，谁还去细琢磨选题思想？写稿那么慢，饭都不吃。干脆把自己当成打字机，弹指之间解决房、车、吃饭问题才是硬道理。有个时期，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忙碌，稍喘口气就浑身不自在，就有罪恶感。后来看见年轻轻的同事没几天，血脂、血压、肝脏都出了毛病，才猛然醒悟：逼自己太甚，旨在缩短生命为代价！于是明白可以食无肉，衣无锦，行无价，无名又无利，却不可无健康，还是慢慢地活吧！

于是容自己在阳光灿烂的上午，唱

（上接第3版）教授乔纳森·金说，“（亚洲的）农民们正在努力地维持对生活物质基础的控制，农作物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他们也在努力维持对自己的文化控制，他们在水稻生产和使用方面的认识就具有代表性。”

四、健康的种子，希望的种子  
工业农民的种子具有与传统农民种子一样的起源，但由于其遗传结构被不断地重新设计以满足农业工业化的需求，它们很难再适应自然。因此，这些基因“外来”的作物，容易受杂草、病菌和疾病袭击，它们需要生武器——人造毒药和化肥，它们绝不可能代替农民久经考验的传统种子。

此外，非工业化的家庭农场主和农民的做法，不仅只是高质量的务农，更重要的是，他们及他们的农业方式是对农业、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原则的表达，也是对社会正义、民主，及微型农业的表达。

与工业化农场主对土地和农村社区的残忍对待形成对比的是，农民和小家庭农场主生产食物的方式能够肥沃土地，并创建强大的农村社会。即使没有通过有机食品认证，美国的小农场主的食物食用起来也是相对安全的。小农对其农作物只喷洒最小量的农药。

农民与具有农业遗传多样性的种子尤其分不开。对农民群体而言根本就没有

有别的选项，同时，生物多样性也只能由小农来维护。只有农民长期以来一直种植的食物种子，才能保证食品安全，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土地和种子促进农民利用他们自己的知识、食品和反抗来与大农场及殖民主义抗争。为了食物和季下的播种，农民自己留种，并成为丰富的遗传性农业生产的保护人。

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休·伊尔蒂斯说得很对，我们应该付费给农民，让他们继续保护自然进化的食物种子，他们在方面做得非常好，没有这些种子农业可能将不会存在了。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非洲农民回过头来种植他们曾拥有的种类繁多的农作物——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失落的非洲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存在于大陆的边缘地带——那将是人类给非洲人民最好的礼物。这样，非洲人将有足够的食物、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取代饥饿，我们其余的人将会确信，那些从经济作物转向可持续农业的人可能来自非洲人那里借种，来扩大他们有限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小农场养活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它们种植有益健康的食物，它们给亿万人们带来粮食和粮食主权，它们是我们反对掠夺性大农场的最好的防御武器。这就是小农场是美丽的原因。

一会儿心爱的歌，翻翻新借的书，发一会没来由的呆，细心整理一下桌子。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的心理，不就是过一种宁静无边的日子？那时候，唱歌、画画、捏橡皮泥，全无一丝功利，就是要玩属于一个人的游戏。太强太快的东西都令我害怕。懒人思想，原来潜伏在心灵深处。喜欢有很多时间，能供人慢慢消磨。一个人慢下来，能细品细味生命，成绩慢下来，城市与乡村未必不更美好。好在在中国现在倡议“后富型发展”，即更看重社会平等而不是速度第一的发展模式。

人们忙碌半生拼命追逐时尚，倒头来却发现回到了起点。骑自行车，吃玉米面，织毛衣，用扇子，保护老物件，这些“落后”的旧生活，原来价值不灭。我们只有一生，最好不为了数字而毁掉短暂的乐趣。有时候，进步的终点，就是盘旋而上又回到的起点。既然人生走不出那个圆，何不慢着点儿呢？

雨晴（一作秋霁）  
杜甫  
天水秋云薄，从西万里风。  
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  
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  
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心灵生态既是理论，也是实践。首先，我从理论谈起。心灵生态乃何“种（type）”理论？其基本观念可简单表述为：心灵生态是一种由现代视角向建设性的后现代视角的理论转型（movement）。物质与精神之于现代主义者是根本对立的。现代西方哲学认为，科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对精神维度的否定与排斥。恰成对照，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以二者皆为人生——这一复杂现象互补的两面。

心灵生态学实为此种结合之典范。生态学为一种科学，当属无疑。它涉及生态系统、动植物的繁衍，乃至有机化学、动植物生理学、精密精微。生态学家长研究之对象乃吾辈（our）之生态系统及吾辈（our）之星球。我们研究自己（ourselves）。我们与研究对象须密不可分。生态学是缜密的科学，也是对种群，亦即吾辈（our own）之未来的记述。生态学涉及我们自身、我们的生存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它是一种关涉自我（self-involving）的灵性沉思（spiritual study）。过程哲学为这一“科学与记述”的结合提供了独特有效的手段。

再举一现代理论的范例。本人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欧洲学界的浸润。辩证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之前150年来，诸先贤（多为德裔，如：莱辛、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前仆后继的结晶。但上述大思想家都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重心灵，轻身体；重精神，轻天。1843年，德国大儒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则反唯心主义之道而行之——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论，重心灵；他则论人，重身体，重人的生存条件。胸怀同一洞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旅程。思维重心的转移使马克思对生产的物质条件、历史上经济因素的作用及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产生了兴趣。他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令人啧啧称奇。

人愤愤尔巴哈与马克思并未超越前辈的片面性，他们仅以此片面性取彼片面性而代之！在其著作中，人类的思想、文化、哲学及宗教仅是建基于并决定于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并没有重建唯心主义思想家们失却的平衡，却导致了另一种失衡（another sort of imbalance）。

马克思主义历经西欧、东欧、俄罗斯，直至中国的长途跋涉，最终找回了平衡。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新的马克思主义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转换的过程。例如，在还处于初级农业文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推行。因之，列宁与斯大林创立了一种同苏联文化及民族性相适应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适应性改造就是一种从现代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转换。

相似的改造也发生在中国。在对马克思理论的接受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敏锐的意识到西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间的齟齬。尽管有苏联的压力，但中国领导人依然没有全盘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及哲学之中，已与学界共识。中国领导人本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化的过程。毛泽东对农村的关注即是中国改造马克思主义之善例。从后现代的视角观之，毛泽东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绝非对过去的否定，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的一种自然有机的发展与“中国化（Sinoization）”。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的同时，也实现了后现代化。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了现代与后现代在理论方面的差异。“心灵生态学”乃是由现代向后现代转换中，一个更加鲜活例证。在这一重要新思潮中，环境科学与人之灵性推波助澜，携手共进。古代中国道家经典五千言，被学者称为“关于平衡的完美宗教（the perfect

## 雨晴（一作秋霁）

杜甫

天水秋云薄，从西万里风。  
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  
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  
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 心灵生态之深思

上文坐而论道，下文实际践行。首先，试从环保运动、生态学说，而非西方宗教的观点对灵性实践（practice of spirituality）做一论释。

包括优胜美国国家公园在内的美国若干国家公园的建立直接源于约翰·缪尔（John Muir）的著作。让我们重温他力透纸背的文字吧：

多数人生于世，却不和于世（on the world, not in it）。对周遭的一切没有自觉的同情与接近（relation）。他们如同抛光后的大理石，光洁明亮，却疏离、孤寂。……多少形神倦怠、道貌岸然的人方才悟到回归山野如回家一般迫切。森林公园与保留地之于我们是水源与水源，更是生命之源。……吾人求温暖，但更需审美；渴望游戏的乐园，但更需精神的依归。自然养吾身，养吾心；赐吾力，赐吾志。……不登高山，何以聆听万物之息。阳光普照大地之时，自然的静谧会滋养你的心田。清风徐来给你新鲜活力，暴雨骤至赋予你无穷力量，你那里还知道什么烦恼。

约翰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不可分离。自然绝非供我们收获取用之物，而是我们自身的扩展与延伸。诚如其言：“欲将一物剥离之时，才发现它与万物相系。（万物相系，不可离）”

我还要强调：人要学会视自己为自然的延伸。如同对待双亲一般对待自然，我们不能离弃它，更不可伤害它。在这样一个广义的家庭中，我们的关系充满生机与“灵性（spiritual）”。同样的灵性弥漫在群山、森林、河流与我们之间。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述他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历险。冬日清晨，白雪皑皑，偶遇野熊，劫后余生。这次邂逅颠覆了他关于存在的感受。在多少次品尝美味佳肴之后，他顿悟到原来我们也是动物的盘中餐（we are also edible to them），这改变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促使他成为一位心灵生态主义者。他意识到，我们掌控自然，自己却是她的一部分（parts of her）。熊口余生使人理解了自然系统的本质是“给与取（give and take）”，人就在此给取之中。

我深知我属于我自己的家庭、妻儿，属于同事，属于我的大学。从广义上看，我还属于我的祖国，属于大自然。每一种关系都有其价值、天赋与责任。我对孩子的责任可能是所有责任中最重要。我精心的养育、呵护、教育他们，为他们我愿献出生命。这些或许可被称为义务，但同时也是父母的至乐。对妻儿、家庭、祖国的奉献是天伦之乐。生态学之灵性也是如此。滋养我们与保护世界，我们乐此不疲。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

我很荣幸曾与著名的非洲猩猩保护专家简·古达共事。简还是Roots and Shoots组织的发起人，也曾在中国举行相关活动。简告诉我她的人生格言是：“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她解释说：“爱全人类，更要爱妻儿。同理，爱大自然，更要给予其中某些部分以特殊的爱。”因之，心灵生态当有其普遍性，但更要于某一生态系统中将之具体化。

我家生活在旧金山以北葱郁的群山中，至今已有五代人了。那里，彩虹在静谧的峡谷中屹立，苔藓在湿润的山坡上休憩，巨浪拍打着岸上的礁石，沙滩上云雾缭绕。游学，我之乐事；然而，回到童年的生态系统，则是我之至乐。大自然常向我微笑，但家乡的微笑则是最灿烂的。我想回家过年的中国人应该与我心有戚戚。因为那里是大自然中独一无二，令你魂牵梦萦之所在。

幼鸟鸣，以及人之幼。爱大自然的某一部分，将之深藏于心底，推及自然之全体。我们经历并珍视全体与每一部分。威廉·布拉克在他美丽的诗句中道出了其中妙处：

## religion of balance)

另一种关于平衡的哲学——心灵生态学之构想与践行，当今中国堪领潮流之先。

## 灵性之深思

上文坐而论道，下文实际践行。首先，试从环保运动、生态学说，而非西方宗教的观点对灵性实践（practice of spirituality）做一论释。

包括优胜美国国家公园在内的美国若干国家公园的建立直接源于约翰·缪尔（John Muir）的著作。让我们重温他力透纸背的文字吧：

多数人生于世，却不和于世（on the world, not in it）。对周遭的一切没有自觉的同情与接近（relation）。他们如同抛光后的大理石，光洁明亮，却疏离、孤寂。……多少形神倦怠、道貌岸然的人方才悟到回归山野如回家一般迫切。森林公园与保留地之于我们是水源与水源，更是生命之源。……吾人求温暖，但更需审美；渴望游戏的乐园，但更需精神的依归。自然养吾身，养吾心；赐吾力，赐吾志。……不登高山，何以聆听万物之息。阳光普照大地之时，自然的静谧会滋养你的心田。清风徐来给你新鲜活力，暴雨骤至赋予你无穷力量，你那里还知道什么烦恼。

约翰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不可分离。自然绝非供我们收获取用之物，而是我们自身的扩展与延伸。诚如其言：“欲将一物剥离之时，才发现它与万物相系。（万物相系，不可离）”

我还要强调：人要学会视自己为自然的延伸。如同对待双亲一般对待自然，我们不能离弃它，更不可伤害它。在这样一个广义的家庭中，我们的关系充满生机与“灵性（spiritual）”。同样的灵性弥漫在群山、森林、河流与我们之间。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述他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历险。冬日清晨，白雪皑皑，偶遇野熊，劫后余生。这次邂逅颠覆了他关于存在的感受。在多少次品尝美味佳肴之后，他顿悟到原来我们也是动物的盘中餐（we are also edible to them），这改变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促使他成为一位心灵生态主义者。他意识到，我们掌控自然，自己却是她的一部分（parts of her）。熊口余生使人理解了自然系统的本质是“给与取（give and take）”，人就在此给取之中。

我深知我属于我自己的家庭、妻儿，属于同事，属于我的大学。从广义上看，我还属于我的祖国，属于大自然。每一种关系都有其价值、天赋与责任。我对孩子的责任可能是所有责任中最重要。我精心的养育、呵护、教育他们，为他们我愿献出生命。这些或许可被称为义务，但同时也是父母的至乐。对妻儿、家庭、祖国的奉献是天伦之乐。生态学之灵性也是如此。滋养我们与保护世界，我们乐此不疲。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

我很荣幸曾与著名的非洲猩猩保护专家简·古达共事。简还是Roots and Shoots组织的发起人，也曾在中国举行相关活动。简告诉我她的人生格言是：“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她解释说：“爱全人类，更要爱妻儿。同理，爱大自然，更要给予其中某些部分以特殊的爱。”因之，心灵生态当有其普遍性，但更要于某一生态系统中将之具体化。

我家生活在旧金山以北葱郁的群山中，至今已有五代人了。那里，彩虹在静谧的峡谷中屹立，苔藓在湿润的山坡上休憩，巨浪拍打着岸上的礁石，沙滩上云雾缭绕。游学，我之乐事；然而，回到童年的生态系统，则是我之至乐。大自然常向我微笑，但家乡的微笑则是最灿烂的。我想回家过年的中国人应该与我心有戚戚。因为那里是大自然中独一无二，令你魂牵梦萦之所在。

## 一沙见世界

一花园苍穹  
一掌握无限  
一刻系永恒

这就是心灵生态学的真谛。

## 怎么活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过程哲学肇始于怀特海。它不仅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还为我们理解心灵生态提供了一个犀利的视角。特提出四点联系，以下分论之：

怀特海认为，我们与其他所有物是“内在相关的（internally related）”。但联系的方式非如皮球间的碰撞，而是双方将对对方的作用与反作用纳入自身后，发生改变。心灵生态学也认为，人类与其他所有生物也是“内在相关的”，因为我们施于其他生灵的或好或坏的影响将成为它们自身的一部分。

所有人都要经受利益的“诱惑（lure）”。然而，选择权在我们自己；声色犬马、高官厚禄，抑或止于至善。心灵生态学将这一过程哲学的“诱惑”一词用于所有生灵，并提醒我们人类不是孤立的，而是生命之网上的的一部分。每一个体都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囊括所有生灵的生命共同体，并为之服务。

过程哲学强调，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行都有持续的影响。每一行为都在作为整体的宇宙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怀特海称之为“客观不朽（objective immortality）”。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构成了迈向永恒的实在。

心灵生态学将之适用于包含我们自身的生态系统。当洛杉矶的上班族们驾驶大排量汽车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爬行时，他们对尾气熟视无睹，对枯竭的石油储备漠然置之。但诸如全球变暖、冰山消融等客观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变化正在发生。影响将持续数百年（many hundreds of years）。这是最坏的“客观不朽”！心灵生态学主张正确生活方式的结果是，当我们逝去时，宇宙变得更好。心灵生态学称其为第四代定律（the Fourth Generation Rule）。“我们应当敬重这一星球，因为我们的子孙将生活于其上。”

更重要的是，怀特海强调过程。我们能从行为的生活与话语过程中，抽象出行为的效力与系统的状态。尽管如此，最深的现实仍然是过程本身。“它是你每时每刻所做的，呼吸、交谈、理解、给予、参与，也是最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以抽象原理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但他们生活的每一片断却远不及描绘的那样理想。反观中国的高僧，他们关注每一瞬间，从我在你面前的驻足到我们的促膝长谈，从分享友谊到休戚与共。心灵生态学绝非一种抽象的哲学或一套理论原则。它是一种心境、心态（mind set），一种意识（awareness），一种生活方式。

## 结论

一门新兴学科名为“可持续性研究（Sustainability Studies）”。它关注生态、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性。由心灵生态学入手，你会懂得可持续性研究绝非抽象的哲学，而是对可持续实践（sustainable practices）的认识。它需要一种平衡：首先，适当的理论框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其次，适当的行动原则（持续性实践）；再次，一种可以将前二者整合为一体的态度——心灵生态学。

心灵生态学提醒我们不要空谈“实践”。可持续性关乎实践，关乎我此时此刻（in this moment）之心境与心态，关涉我今天行动。那张囊括我的生命之网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永不停之不去。

谨以陶渊明的《饮酒》结束全文。

##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 做个智慧的企业领袖（下）

——【美】大卫·施沃伦博士（DAVID A. SCHWERIN, Ph. D） 郭晓慧 译

## 领导者的慷慨给予

“圣人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

慷慨给予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迈蒙尼德，十二世纪犹太学者，列出8种给予方式，每进一步都更值得称道：1）给予怜悯；2）很高兴地给予一点需要；3）给予有请求的帮助；4）给予没有请求的帮助；5）给予非特定求助者的帮助；6）给予特定求助者帮助，而不留姓名；7）给予非特定求助者的帮助，而不留姓名；8）给予穷人帮助，给他们提供免息贷款，雇用他们工作，或教给他们自力更生的一种技能或专业。在本文部分，讨论了各个商界领袖回报他们所在组织的各种方式，我们将看到几种给予的类型以及从中收获的益处。

容易理解的是，最近的经济危机之后，使用慷慨一词来形容商界领袖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就许多商业团体的领导而言，过去十年中充满了贪婪、短视和鲁莽行为。然而，具备自我意识的高层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只是整个链条的一小部分；如果想要使他们所依赖的经济系统得以蓬勃发展，那么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必须得到尊重和滋养。正在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的主体需要向那些而正在渡过难关的伸出援助之手，而慷慨只不过是对此必要行为的一种认可。正如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2009年12月9日的讲话中简洁而雄辩地说：“在伦理上，领导人都肩负着缩小贫富差距这一共同的责任，我们的行动必须包含乐于助人目的。”（Sharavana, 2011）

## 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见下文）。千百年来，所有的文化都告诉我们，生活的根本准则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大多数人都渴望某种形式的富足——物质、情感、心理或精神，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别人达到同样的目标吗？永恒的智慧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理由，那就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相反，拒绝帮助别人使自己失去更多，甚至超过了他人的失去。它使你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东西。”

（Pierakos, 1975:2）事实证明，慷慨实际上是确保我们的自身利益。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商界领袖已经将黄金法则作为他们引导公司走向成功的原则。

尽管航空公司这一行业极具挑战性，但是西南航空公司一直是最成功的航空公司之一，这得益于其工作人员的政策建立在黄金法则之上。公司高管尊重地对待他们的员工并且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结果就是，西南航空公司的领导人从他们的雇员那里期望更多，也得到更多。员工知道该公司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也期望通过实现他们领导人的愿望而得到尊重和信任。更具体地说，员工很乐意与客户公平而友好地互动。这样的工作态度确保了顾客的满意度和忠实度，这就基本保证了公司的繁荣。这是一种只有员工感受到领导关怀才有效的商业模式。（Schwerin, 2005:184）

**佛教：**害人者害己，害己者害人！——公元前6世纪，《法集要颂经》（梵：Udana-varga，又作《优陀那品》）第5章第18节。

**基督教：**你想别人如何对你，你就如何对别人！——公元1世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2节。

**古典异教：**别人愿意为我所做之事，我也愿意为他做。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元前6世纪《论语》第十五章第23节。

**印度教：**不欲受之，切勿施之！——公元前3世纪《摩诃婆罗多》第五章第1517节。

**巴哈依教：**凡是自己不愿承担的，也不要加在别人的灵魂上，凡是自己不欲得到的，不要叫别人得到。——公元19世纪《巴哈乌拉作品集》。

**伊斯兰教：**唯有以己之心体谅同仁之心，方可入道！——公元6世纪《穆罕默德》。

**灵那教：**无始以来，所有的生物（灵魂）都是在业的束缚中，而业是善或恶行为的积累。在业的影响下，灵魂习惯于在物质财富中寻找快乐，从而就有暴力的想法、行为、愤怒、怨恨、贪婪及诸如此类的罪恶在心中扎根。这些结果也导致业的进一步积累——公元前5世纪，第24届耶和瓦哈维那节。

**犹太教：**己所恶，勿施人！——《犹太法典》之安息日第31章A节。

**美国本土：**不要谴责与你在一个领域内的兄弟。——出处未知。

**锡克教：**不要与人人敬奉的上帝为敌！——著名经典《阿底格兰特》259页。

**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论语》。

**波罗亚斯德教：**自然之母自爱，不做自伤之事！——公元前5世纪《波斯古经》第五章94节。

**典型的慷慨行为**  
领导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慷慨。以下是三种基于现实的有效的情景。

**表扬员工的努力并视需要提供好评赞赏。**2001年，在道格·科南特曾聘请为金宝汤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不久，该公司的一项工作热情参与比例为2:1，这意味着每两名雇员中就有一人感到不满。而根据冠奥通康体实业有限公司的调查，该行业为公司的利益行事为12:1。冠奥通康体实业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告诉科南特，“这是我所见过的世界500强公司中最糟糕的结果。”科南特有着做这项工作的天赋，他开始改变，表扬该公司的员工并告诉该公司的领导人要关心员工的福利。他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提高建筑物的安全系数，使硬件设备更具吸引力，提供更多的灵活的工作时间，创造更多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和包装（科南特和诺加德，2011:16-17）。这些步骤极具意义，但科南特很快就意识到，与员工建立强有力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为此，他开始每天派遣十到二十个人，亲手记录并感谢那些做出额外努力的人，以欢迎新员工或对某种成就表示祝贺。所有的其他员工共享这些记录，这反过来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即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科南特和诺加德，2011:116），因此金宝汤公司员工的参与率开始上升，到2010年已达到17:1的超常水平（科南特和诺加德，2011:19）。作为回馈——科南特每天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小时写信给他的员工并为他们提供能够受益的稀缺资源——大额有偿股息。正如科南特亲身体验到的，“领导者要指望员工关心公司的议程，就必须关心员工的利益。”（科南特和诺加德，2011:15）

**给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换句话说，要把员工作为一项资产，而不是负债。大多数业务领导人，受短期利益驱动而常常削减人员成本。相比之下，印度服饰最大的和增长最快的零售商Pantaloon，给新聘人员提供了为期六周的前线培训。此外，据Pantaloon的首席执行官巴雅尼说，“我们要执行一项公司中所有人员都参

与的计划，称作‘设计管理’，就必须调动每个人的智慧，发挥大脑视觉审美和逻辑理性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卡普利，辛格，辛格和尤西姆，2010:72）。在他们的著作《印度之路》中，作者采访了印度许多商界领袖的个人政策。他们都认为，在公司重组这一重要的事之后，排位第二重要的就是给他们的员工创造发展机遇和丰富他们的生活。塔塔国际董事长穆瑟曼（Muthuraman）告诉笔者，他的目标是“让别人快乐。就是这样！”这种做法可能阻碍短期利润，但给雇员创造一个宽松良好工作环境，员工会自愿地保护公司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他们也会为公司的利益行事（卡普利等，2010:79）。在巴塞罗那举行世界零售大会上，Pantaloon零售商赢得了在纽约举办国际年度零售商全国零售联合会资格和新兴年度最佳零售商的称号。

**爱护环境，回馈社会。**人们喜欢为对社会负责的公司工作。这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即使是远离家人和朋友，也有很高的工作热情，愿意倾心工作。墨尔本维西(VISY)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废纸回收和包装公司之一，其总部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雇员有数千人，遍布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和美国。他们有着简短醒目的标语——“创建森林城市”，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维西(VISY)公司有一个长期的计划。他们为当地的失学儿童制定了教育计划，旨在唤起全社会对回收利用的广泛关注。

在接受澳大利亚联合国协会环境的最佳实践奖时，维西(VISY)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哈里·戴布尼说：“维西(VISY)公司致力于环保的最佳做法包括了：企业的日常工作——这是使我们充满热情要做的一件事；有效处理日常生活中问题以及所有的重大项目。”除了其对环境的贡献之外，维西(VISY)公司将其税前利润的3%捐赠给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慈善机构。正如前维西(VISY)公司首席执行官普拉特说，“这是惊人的，我们给予的越多，公司的利润就越丰厚。”（《慷慨回报作品集》（什未林，2005:22-6）

**慷慨的形而上**  
“圣人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

以与人己愈多。”——老子

我们已经看到，慷慨不仅仅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务实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慷慨给予这种行为是接收宇宙财富的一个先决条件呢？在下一节，我们将以一种很容易理解的事例开始，然后夹着一些科学的例子，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形而上的分析，以作解释说明。  
站在简单而实际的角度，很容易想象给一个已经充满整个容器边缘的容器再加入其它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多余的空间。只有当容器部分地或全部地清空——即分发出一些东西——才能够接受其它东西。同样，当每个人被所谓的“物质”——物质实体、情绪反应、精神压力——填满时，就必须释放，本质上就是放弃，才能接受新的事物。

我们转向生物学寻求一个更科学的解释。据生物学家和畅销书作者布鲁斯·利普顿博士研究，细胞是人类的缩影，它们教给我们大量有关生命的结构问题（2005:27）。每个含核细胞具有的功能相当于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排泄系统、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循环系统、生殖系统以及免疫系统。每个细胞是一种智能化实体，可以靠自己存活下来；每一个细胞都能适应其自身所处的环境。细胞要表现出“智能”的行为，需要一种功能膜，这种功能膜与受体（意识）和蛋白质效应器（行为）发生作用。这些蛋白质复合体是细胞情报的基本组成单位。生产蛋白的细胞核与细胞内膜相互作用发出了环境信号。细胞膜接收刺激，然后开始进行恰当的维持生命的细胞反应（利普顿，2005:128）。机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组成部分都有蛋白质参与。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物质，在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活动的存在。（利普顿，2005:188）在细胞层面，细胞是所有膜体蛋白感应接收“情报”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利普顿，2005:87）在身体层面，相应的意识过程是心灵和精神提升到更高的意识的过程。

很难知道细胞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开始的，但这个互惠的相互作用是维持生命的关键。尽管每个单独的细胞都有智力和意识，但是这远低于我们身体内的多细胞有机组织体。原始生物的神经系统很不发达，它们依靠

本能而生存。  
与此相反，人类则有着比原始生物更强大的能力，以获取和吸收新的知识；相较于本能反应，人类的成长更依赖于学习的能力。（利普顿2005:160），人类必须学会的事情之一是：为了获得宇宙的财富——精神指导、保护、连接、医治等等——他们必须首先愿意冒险放弃他们非常重视的东西。他们必须明白宇宙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他们才可以开始接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礼物，这些礼物对人类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

给予和接受，是一个连续的流，相互依存，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存在。一旦不信任、可怕的贪婪进入生命之流，给予和接受的过程就会终止，而我们也丧失了人类特有的圣恩。

斯里兰卡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圣恩就像是一个流动的河：它始终向一个方向流动；如果你朝反方向走，你就必须准备面对后果。”

每一种态度或者行为，每一个心理和情绪所产生的反应——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是基于对信念正确或错误的认知。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个贫穷的世界，我们需要聚积财富、人才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能给予，同时也不可能接受。相比之下，一旦建立了给予的态度，我们的内部和外部财富就像永无止境的一样不断地更换。

我们给予的越多，接受的就越多；接受的多了，就能更多地给予。因此，给予和接受是一个统一体。（皮尔瑞克Spiriakos, 1978:3）

1970年，罗伯特·K·格林里夫制定了一个条款，一个领导者是否把给予放在最高位置的标志是否遵循服务型领导原则。服务型领导，遵照无私奉献的“服务模式”（Trompenaars和Voerman, 2010:15）；具体来说，服务型领导关心员工并帮助员工实现他们作为人而不是雇员的全部潜力。他们也热衷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更好的公司。（Trompenaars和Voerman, 2010:9）

服务型领导不是简单的空想，在过去几年，美国财富杂志100个最佳企业中前十名有六大企业践行服务型领导原则。真正的给予者的确能够带来回报。

就我个人而言，我和妻子都亲眼目睹了惠恩在我们的生活（下转第4版）

## 小农场是美丽的

【美】E. 瓦连纳托斯 (Evaggelos Vallianatos) 武汉社会科学院 谢琼译

## 一、农业：文明之母

希腊人拥有诸神保佑和辅助他们的农业、农民及农耕文化。生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的牧人和诗人赫西俄德赞誉农业为文明之基础。他敦促农民以正义为荣，这样他们的橡园就将获得丰收，收获丰富的“橡子和林中的蜜蜂”。另一个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的希腊思想家、军人、历史学家色诺芬，确信农业是科学之母，也是士兵的训练场和政治实验室。实际上，农业一直是人们作业于土地并种养食物的方式和方法。正是这种本质性的内涵，造就了人类数千年的宗教、技艺、科学、政体和国防。只是在近1500年左右，农业才逐渐失去了其首要地位。这是由于西方社会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愚蠢地将农业扔给商人和国家，并再次造成了大农场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极端不平等现象。

然而，工业化的大农场比过去那种大农场更为极端。它以科技和国家权力全副武装自己，“生产”的食物违反科学、营养和安全标准，也就是说，工业化农业所生产的食物不利于人类营养和健康。此外，大农场主使用的有毒物质正在削弱和毒杀野生动物。同时，大农场主还在驱逐农民和小农场主离开他们的土地，进而为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政治野心腾出空间。

我所谈及的小农场，指的是在地块规模上为一到几英亩的农场，可能最多只有10英亩。我出生于希腊，家里的农场拥有几块土地，总体规模在四英亩左右。我们自己生产橄榄油、酒、小麦、大麦和扁豆，还有一些鸡、小群的绵羊和山羊。我们用骡子拉的犁耕地，亲自做各种农活，我们的食物能够自给自足。我对那时的记忆始终是鲜活而快乐的。是的，我们工作辛苦但不挨饿，即使是在1940年代早期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占领我们村庄的时期，我们依然不必为食物担忧。我家的小农场是美丽的，因为它教会我优质食物的重要性，更让我明白努力工作、独立自主的重要性。现在，在我离开希腊前往美国的50年之后，在我接受了美国教育、积累了知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后，我依然要感谢小农场是美丽的。我在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做了史学博士后研究，我在美国国会山和美国环境保护署工作了27年，也曾任教于数所大学，写了大量有关农业和环境保护的专著和论文。我工作的焦点一直是捍卫小农场的完整性，并强调其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在我转向阐述小农场的生态和政治优势之前，我将快速总结大农场（大于10英亩）的危害性特征和影响。我所引用的大农场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农业。

## 二、病害侵袭土地

美国农业从生产食物和维持民主社会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赚钱和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后，已经对自然、食品、人类健康和民主产生了难以置言的恶果。

可以把这种巨型农业形象地比喻为根植于土地的大工厂，它不仅将耕作和食品工业化，而且也把农业工业化，使得美国农村成为榨取利润的殖民地。这种变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留下成千上万破碎的家庭农场、备受污染的水和土地、混乱和有毒的自然，以及被城市文化和力量侵略并征服的伤痕累累的美国乡村。

这种困境起源于19世纪，那时机械化改变了世界的社会和自然。根据1884年《加州农业社会》，1880年代的困扰是“将会存在太少的农场和那些太大的农场。当地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共和国将无法长期存在。任何人必将为家

园而战，但是更需要一个十分勇敢的为推翻工资特权制度而战的人。”

这种大农场抑制民主的担忧在20世纪成为现实。

纽厄尔是美国复垦服务中心主任，他负责执行1902年的《复垦法案》，该法案以创建家庭农场为目的，灌溉美国西部荒原。纽厄尔在1905年说：“《复垦法案》的目标关键是创建家园，而不是单单灌溉土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断强调，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家园，不是灌溉那些大小公司的土地，不是为了让这些富人富有，而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条件，即土地必须掌握在小农场主的手中，有家的人能获得足够的土地来供养家人，能成为良好市民，能够享有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舒适与必需品。”

1939年4月，约翰·史坦贝克出版了《愤怒的葡萄》，记录了巨型农业背后过度的政治权力及其造成的悲剧般的社会副作用，尤其是在加州。他描述了逃离自然灾害的农村居民的委曲求全，为了不挨饿，他们不得不接受大农场近乎奴隶般的条件。1939年夏天，加州农业综合企业区的支柱W. B. “Bill” Camp，监督了《愤怒的葡萄》从加州科恩县——《愤怒的葡萄》主演齐德的家乡的学校和图书馆取缔和焚烧。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小农场的消亡和大农场的诞生，美国农业部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企业法人的篮子里。

沃尔特·戈德施密特是美国农业业诚实的人类学家，1940年代初，他揭露了工业化农业对美国乡村的毁灭。他警告美国人：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公司正在动摇整个美国的乡村社区。大农场主榨干了小镇的生命，迫使学校、教堂、医院、公共交通等公共机构，以及小型企业不断衰弱。戈德施密特说，当一个乡村小镇拥有大农场时，它就变得像一次短暂的露露，所有的公共服务几乎不复存在，小型企业全部倒闭，民主生活倒退，镇里唯一剩下的工作就是为农业综合企业服务。至于那些小农场主，每当发现自己被农业综合企业包围时，他们就被迫放弃其农耕事业。

199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Linda Lobao出版了她关于农业工业化对农村社区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她重拾了戈德施密特未竟的研究，利用美国3000个县的数据进行论证，北达科他州大学的Curtis Stofferahn在2006年更新了Lobao的研究，通过总结50年的社会学研究结果，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农业工业化瓦解了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凡是畜产品聚集的地方就会构成环境威胁，更能形成新型的“富人和穷人”。也就是说，Lobao和Stofferahn证实了戈德施密特对于1884年加州农业社会的担忧，即大农场对社会和民主是不利的。

我个人的研究也证实了戈德施密特的研究发现，即在农村，太多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会毁灭民主，这仅仅是对于希腊人一个脚注式的提醒。  
2012年2月，我走访了位于加州中央谷的乡村阿尔文和迪努巴，那是戈德施密特在1940年代初研究的地方。戈德施密特在阿尔文镇发现，该镇被大农场包围，混乱不堪，充斥着所有衰败的迹象：糟糕的学校，公共服务面临崩溃。70年之后，我发现阿尔文镇已经不能称之为镇：它就像一个社会和技术的贫民窟。数千英亩大小的农场占据了阿尔文镇。2012年，阿尔文镇只有一个部分时段开放的图书馆，没有医院，大约20000人的入口却只有一个杂货店。  
戈德施密特研究的另一个镇迪努巴镇，在

1940年代初曾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城镇，因为它周边的农场，即使是那些按照美国标准规模最大的，也至少是100到200英亩。现在迪努巴镇的农场太少而且规模巨大。但由于迪努巴镇拥有固定家庭农场的传统，其社会与生态的破坏程度不如阿尔文镇厉害。

然而，迪努巴镇没有中产阶级或者小型商业及市中心。其人口和阿尔文镇一样，在20000左右，而且绝多数是西裔墨西哥人。少数白人可能管理着这两个镇的大农场，但是这两个镇里大量的白人已经随着家庭农场的消失而销声匿迹了。

巨型农业的破坏性大于社会组织性，有时甚至致命的瓦解和伤害自然界。美国生态学家Carl Buckingham Koford的报告指出大型农业赖以维系的杀虫剂导致了生态剧变。1958年，他谴责农场主、农民和政府机关使用氟乙酸钠的陋习，这个代号为1080广为人知的化学品，可毁灭动植物，尤其是有益的啮齿动物。“除了杀害草原土拨鼠”，Koford说：“复合1080的连片使用对动物群落有其他的影。该化学品有剧毒，能杀死其他以谷物为食的哺乳动物，如白尾灰兔。其毒性很稳定，即使通过动物体内组织作用后也不能被分解，因此，那些食用啮齿动物的肉食动物也经常被害害。士琅(邓禄普)因二次中毒几乎在平原上消失了。此外，毒药的应用给不同的哺乳动物种群带来了灾难性改变，更进一步带来不同物种之间的各种连锁反应，并改变了它们对植物和土壤的影响。”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巨变，是对文化和生命的侵占，用灾难来比喻农业工业化对自然和农村社区所做的一切毫不为过。Koford是正确的，给猎人的狗下毒毁灭的不仅仅是食毒的狗，就像农村小镇一样，当家庭农场沉没的时候，村镇也就土崩瓦解了。同样的，当土拨鼠陷入困境，土拨鼠巢穴中周边的其他野生动物群落也会纷纷离开。Koford对土拨鼠的感情，也是一个了解自然的生物学家的感情。他说啮齿动物是有益于人类的物种，“它们改善土质并选食有害植物和灌木，给其他动物提供食物，而且使水景变化的生动活泼。我们还能从任何动物身上期望更多吗？”

此外，机械化的农场占据了世界上更多的淡水。

国际农民民间团体组织——农民之路指出，正是这些恐怖的巨型农业正在把全世界的小农场推向“无可逆转的消失”的边缘。

## 三、小农场的全盛时期：传统农业知识与实践

一位致力于非洲传统农业研究的英国学者保罗·理查兹说，“也许专注于丰富基因库的事业更有意义，让本地人去做余下的事情。忘记绿色革命[农业工业化]，尊重当地的神圣习俗。包租一架飞机，把国际水稻基因库收集的种子的复制品向四方散播出去。”

保罗·理查兹是对的。门迪农业是真正的专家和最好的水稻遗传多样性的守护者。傣族的神圣林或神山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傣族农民，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农民，用大量的各类植物获取食物、纤维和医药。

有几处土著人的民族植物学知识是十分了不起的。达雷尔·艾迪·波西是一个英国民族植物学家，他工作中曾与被称作卡雅布/Mebugokre（水边人士）的亚马逊印第安人广泛接触，他曾这样说：“在他们管理热带雨林的的过程中，他们已开发一套社会和农业系统，在同样的环境中，这套系统要比任何已有的甚至当今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明发现’能更好的适应脆弱的生态系统。”

墨西哥的泽尔塔尔人和皮尔佩切斯人分别能识别超过1200种和900种植物。这源自他们对大自然运作的认真研究和理解，而大自然的运作则是传统农业形成的基础。农作物与牲畜混种混养，将农作物在森林边或森林中与树木生长在一起，构成了传统农业体系。将农作物与牲畜混种混养是很好的农作模式，因为这样可以方便的给土地施肥，并能保持害虫在控制之下。

套种的农作物可以吸引昆虫捕食者，也可以吸引那些控制害虫和杂草的寄生虫。此外，农民手中的传统种子具有更强的抗病性。农场牲畜（猪、鸡、牛）为农民提供奶、肉和牵引动力，同时它们吃杂草和秸秆，将其转化成成蛋白质和土地肥料。

那些为生存而奋斗的恰帕斯（墨西哥南部一州）农民，每公顷种植两吨玉米，而其隔壁的工业化农民每公顷产6吨玉米。基于这个原因，农业专家认为小农是落后的，并坚持要他们离开土地或者采用机械化的种植方法。然而，那些工业化农民除了六吨谷物，并没有从土地上获得任何其他东西。

恰帕斯农民不仅只是生产玉米，连同玉米一起，他还种植豆子、西葫芦、南瓜、番薯、番茄和其他蔬菜、水果和药材。农民将一些食物出售换取现金，剩下用来供养家庭，喂养鸡和牲畜。恰帕斯农民“轻易地生产超过15吨/公顷的谷物，而且不使用化学肥料或杀虫剂，也不需银行或政府或跨国公司的任何援助。”这种按传统知识播种所收获的食物供养了世界上大部份人口。

第三世界国家的原住民和农民正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珍贵的亚马逊河及各类原生河流，维持以土地为中心或快乐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和实践他们懂得并实践的那些东西，这样才能阻止全球毁灭生态和毁灭人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

农民与原住民不把社会从生态中分出去，两者本为一体。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工业社会思想家们的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所谓的理论是活生生的，是生活的构成部分。

例如，安第斯山脉的农民，依然拥有社会制度和知识，来复兴他们前西班牙时期的生态农业。  
西班牙学者琼·马丁内兹·阿里说，安第斯山的农业“给人类遗留了大量的家养蔬菜，这些是不能用货币价值来评估的。...在[秘鲁]海岸，那里自然干燥需要灌溉，但水力文明的发展却不及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这不是纵横一两条河流，却是五十支河流……更显著成绩包括安第斯山的大梯田和灌溉系统，由社区控制综合休耕制度，以及高原地区的农业式田地（高位田地）。

更了不起的是开发和管理数百个适应不同生态的马铃薯品种，以及许多其他品种的块根作物和谷类。”

此外，在秘鲁有一种前哥伦布时期的高海拔的农业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沟渠中间的高位田地（瓦鲁—瓦鲁），这种方法能够生产丰富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藜麦、苜蓿、块茎酢浆草（木酢浆草），能够提供人们更合理的饮食和更好的收入，并维持更健康、更富弹性的土地。安第斯山人这种瓦鲁—瓦鲁的农业方法——通过隧道输送水给梯田和高位田地——对于在恶劣环境下种植粮食，是非常有效且精致的方法。沟渠里的水慢慢渗透到高位田地，这样就可以给土地降温并阻止生长中的农作物死于霜冻。农民在沟渠中用淤泥、泥沙、有机残留物来给蔬菜或作物施肥。

慢与快

[北京] 陈晓凤

效率至上的时代，快就一定比慢好吗？不见得。不久前受人之托，给一位曾离异的相识女士介绍男友。本来感觉两人挺般配，之前又做了挺多铺垫。可见面之后，女方很满意，男士却委婉拒绝了。推测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女士的大姐始终参与其中，急着追问男方的经济条件，又急着催要答复，结果如此强势的准“大姨子”，让男士感到了压力。

那位急性女士是做生意的，习惯了风风火火，三句话不离利益关系。她的实用与效率，让亲朋好友敬而远之，谁都不愿被人在地底威压。小时候的她，是个慢性子的小胖丫头，整天在楼下打乒乓球，天性幽默有加，苹果般的脸蛋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后来下乡归来，又下海做了生意，就变身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一举一动目标明确，一分钟时间，一点点人脉资源都不浪费。可快了十几年，小钱大概赚了一些，生意却远谈不上成功，儿时的可爱也一去不复返。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节奏太快，顺利地到爱情，人脉都断了。我想，她若是懂得很多事情要慢慢来，他来决定需要时间，感情需要培养，也不会吓走了那位男士，妹妹此次的缘分也可能还有希望。太太快的人，常常欲速不达。有个80后姑娘结婚时感叹说她是落后者，有的同学都离完婚了。

前不久有个朋友去南方探亲时顺便旅游，行程安排满满，高高兴兴地出发。可刚走第二天就打了电话来，说是旅途中不幸鼻子骨折，结果整个行程都在痛苦中度过。痛定思痛，她说，这事给了她一个警示：年龄不饶人，一定要让生活节奏慢下来。以往，她的生活日程总安排得很满，天天上班打两份工，周末休息两天，还打一天去公园锻炼，一天去北国看书，家务就忙中抽空。

节奏快，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高。几十年前知青下乡，有人本想往农村接着闹革命，却发现天高皇帝远的乡村竟像是时间停了。没有钟表，没有电灯，下地看日头，夜晚点油灯，家家土坯房。每天敲了钟，老乡慢悠悠地晃出来，下地里去磨洋工，留着劲儿种自留地才使。老人蹲在

墙根下晒着热烘烘的太阳，看着满地乱爬的孩子。长长的冬夜，全家盘腿在炕上搓玉米粒。再闲了，老哥们抽着旱烟侃大山，三国、水浒百说不厌；老娘们纳鞋底子，姑娘绣鞋垫。大队长派人找来游走的瞎子，给乡亲们说书，工钱就是几张烙饼。那会城市物质上，就是乌黑发臭的河水，饭桌上都是原生态的粮菜，家家老婆孩子热炕头，骨肉从来不分离。

再后来乡下人懂了效率，穷怕了，挣钱的劲头比城里人还大。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大邱庄，看到是高大的工厂、漂亮的别墅连片，就是乌黑发臭的河水。在北京天津近郊的一些村走走，这样的景观不难见着。脱胎换骨上，除了金钱的数字，其他一概顾不上。原来以为中国农民最珍惜乡情，却发现他们如今在金钱面前照样能六亲不认。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梦想靠宅基地神奇暴富，急着在宅基地上盖房子，寸土必争，最后乡下连种根黄瓜的地全没了。除了阳光不能锁住，所有撒了种子的地，恨不得全用大棚锁起来。暴富与赤贫相映衬，是乡村高效运转的第一人。

村里最富的肯定是村干部，他们有权买卖集体土地。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短短几年就全部“造”完了。农田被卖给商人盖房、造工厂，山卖了挖矿。多少年下来，山也秃了了，水也脏了，土地被化肥、农药毒化了。有人回老家，形容家乡如今变得“满目疮痍”，童年时代清澈的小河早已变成了毒河。家家只养一老一少子留守，老婆老公一年见不了一次面，孩子生下来后几年见不着父母。这样的乡村效率，换来的却是GDP的高速增长。新农村节能，更让乡村日新月异，温馨节能的传统农家院，变成千篇一律的高耗能小楼。只有在心底，人们还回忆着昔日的悠悠田园时光，回忆那点儿珍贵的农人自由。

有时候走在街上，见到那些满脸愁容、神情麻木的农民工，我总是揣测着，他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幸福？现在他们挣的钱数，可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们曾拥有不需花钱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美丽的大自然，现在那

些都成为最奢侈的。对土地的眷恋消亡了，速度催生了无根的一代。到城里打工的农家后代，甚至羞于被称做“农民工”。

城市的节奏更让人炫目。城市已变得越来越陌生，在“保护的口号下，老房子以大跃进的速度消失在推土机下，城市成为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中国人几大去欧洲旅游，看人家几百年的老建筑，却毫不手软地拆掉自己城市历史悠久的老房子。20年来，中国的私人汽车的数量翻了几番，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当德国等欧洲国家正在修建全封闭高速公路、骑自行车成为世界环保新风气时，北京的马路上却堵满了小汽车，成为丑陋的大停车场。大房子，私人汽车，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盖房子、造汽车，最能增加GDP，高效制造出的数字背后，是城市水化、空气污染，道路堵塞。

由于尾气污染，北京的肺癌发病率已居众癌之首。中国癌症病人增长的世纪纪录，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成正比，与留守儿童的数量增长、私人汽车的数量增长也成正比。在北京开汽车上班，每月停车、汽油费至少得花2000多元，相当于很多农民工的月薪。时间就是金钱，怎能不努力挣钱呢？

有“轮子上国家”称谓的美国，曾因汽车普及城市扩张饱受痛苦，现在很多美国人厌倦了依赖汽车的生活，喜爱上了步行街区，甚至出现专业网站公布社区的“步行指数”，以供买房者参考。美国一些城市远郊的大房子，售价已跌到成本价以下。只有12%的消费者必须开汽车出行的房子还感兴趣。

有人深切怀念北京的自行车大军时代。那时虽然没钱买汽车，可是没有pm2.5，没有每天两小时的路程。那时天空蓝瓦蓝瓦，空竹嗡嗡作响。无事的午后，在四合院的浓荫下，泡上一大壶茉莉花茶。人在柜子里塞满名牌服装，没人买得起LV，可是城市有己有的味道，空气、水源都有干净。以前多如牛毛的小街，老人走着就能串门。现在在北京，马路太宽了，只适合汽车的速度，行人不是紧着赶路，马路就过不去。北京大跃进式的修路，换来的是“世（下转第2版）

三、朝话之人文篇概述——祖坟与古树

在可能的情况下，社团均会意识地祭拜了所在村庄的姓氏祖坟。岳村祖坟祭拜了于氏祖坟，杨村祖坟祭拜了陈氏祖坟和杨氏祖坟。祭拜祖坟使大家体验到了崇先敬祖的感性。于氏祖坟是元末明初以来300多座坟墓形成的古墓群。始祖于氏于氏祖坟长眠着上百位于姓仕宦，其中包括于谦、于升、于胜、于玠，于氏牧等达官显要，包括进士、举人和贡生等80多人，且多为夫妻合葬墓。墓群占地173亩，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附近岳村的历史达900余年了！这里群岗起伏，林木蓊郁，宁静肃穆。新村杨家祖先是明代一个大将军，从洪桐县迁移过来的，碑文是1975年立的。陈氏祖坟与杨氏祖坟东西相对，祖坟的面积，通过防止它垂吊下来，仅有一亩地，我们也都虔诚地到坟头去。有来自北京平谷、陕西渭南、河南灵宝、周口、商丘、驻马店、新乡、洛阳、信阳、南阳、郑州，等等。在仪式上，我们祝福村庄老祖先保佑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也希望长眠于地下的老祖先们，能够祝福队员在对乡老坟的理解上更为成熟。

古坟即意味着族脉、族神。于氏宗祠前的对联——西周启姓家声远，东海流源世年长——提醒着我们：远从周朝启姓之始，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们，就是家族连续线上的人，就天然地成为家族人，通过血缘和血缘伦理谱系，人们把生命的有限限于无限之中。传承家族文明，是中国农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法宝。古坟在文革时被砸烂古碑和石像、改革开放初期重要古墓被盗窃等历史遭际，述说着世道变迁的沧桑；而留下来的碑刻、家谱、墓志等，均有民族大迁移、抢军

河决口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痕迹在上面，无不具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水利学、文学等丰厚价值。

古坟必然与古树相关。无论是于氏先祖、陈氏先祖、杨氏先祖，均在早期生活的村庄和葬后的坟上植有树木。于氏坟地长有一棵600多年的黄腊树，这是通许县唯一的一棵，它是稀有树种，生长缓慢，木质坚硬细腻，种子发芽率低，仅为万中取一。于氏先祖在祖坟上植下了这棵黄腊树。陈氏祖坟上依然活着一棵整个豫东都罕见的唐柳树，有二、三百余年的光景了，树干、树枝极其坚硬，叶子泛白色，春季里开的花也是白色的，生出的果子密密麻麻地！这里群岗起伏，林木蓊郁，宁静肃穆。新村杨家祖先是明代一个大将军，从洪桐县迁移过来的，碑文是1975年立的。陈氏祖坟与杨氏祖坟东西相对，祖坟的面积，通过防止它垂吊下来，仅有一亩地，我们也都虔诚地到坟头去。有来自北京平谷、陕西渭南、河南灵宝、周口、商丘、驻马店、新乡、洛阳、信阳、南阳、郑州，等等。在仪式上，我们祝福村庄老祖先保佑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也希望长眠于地下的老祖先们，能够祝福队员在对乡老坟的理解上更为成熟。

四、朝话之民居篇概述——老院落

您可曾细细品味过乡村老院落的丰厚意蕴？这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感的院落。户主陈公，85岁，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大爷。这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普通砖瓦房，但样式是老的。房顶上是样式多元的小瓦片叠堆成的好看造型，两边

新农村建设之情景分享行动（二）

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何慧丽

相同，中间特色；房子的门楣上挂着黍谷之类的穗子，屋内的墙上还有其他一些年来要作种的芽窖，用厚厚的柴草下面有一个辣椒串之类的东西。窗户是铁栏木框的。院子的栅栏门是由粗细不一的杨木、槐木、榆木、桐木组合拼成的，只是用于挡一下院内家禽飞出去用的。门的一侧有一个深红色的大石臼，定是少多少辈的农具了，谁能猜得出倒底有几百年，还是上千年？以前用做春米、捣粮食的，现在偶尔用来捣蒜泥什么的；墙角一个大缸，有100多年了，先是装水用的，后来用于装粮食的粮仓用，天长日久，缸子漏了、烂了，就用作喂猪的猪槽用了。最耐人寻味的是厨房里烧土锅用的老风箱：里边有个长方形的桐木箱，用上好的公鸡毛把木板粘裹得严严实实的，拉起来就会发出“呱哒哒……呱哒哒……”的声音，那抽进锅底下的风“呼呼……”地响着，火苗就旺发起来了。老风箱作为土锅烧饭的天然伙伴，其历史何止成千上万呢！

这是一座有着循环的、多元生命的院落。院里木象很盛，大小不一，有粗有细，从几十年到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四十余棵树木里，有椿树、楝树、榆树、杨树、桐树等多种品种，种类丰富的树木随着季节变换在打扮着小院的春夏秋冬。院里两棵枣树之间晾挂衣物的铁丝，其与树的接触处用胶皮鞋底垫着，怕随着树的生长把树干给勒疼了。树木下面，整个院落至少有两类堆儿，一类是树叶堆儿——树枝树杆堆儿——树枝柴堆儿，这是一完整的树木身上所有东西的分类扎堆儿；一类是苞米芯儿——玉米杆子——苞米叶皮儿——苞米穗毛堆儿，再加上里屋袋装的玉米籽，是玉米秆身上所有东西的分类扎堆儿；还有棉花壳堆儿、棉杆堆儿，等等。这些堆儿，大部分是要烧火做饭烧掉的，能卖掉的也会卖掉，能做其他使用的都可以做其他用途，剩下的会做为堆肥的原料使用。真是物尽其用啊。院里不时地有几只公鸡、一群母鸡在嬉戏。鸡舍旁边的泔水池，是

家禽、家畜和人的粪便以及生活废弃物在这个院子里的最终归宿。最让人吃惊的是大爷家的萝卜窖，在厚厚的柴草下面有一个深坑，用手拭去坑里温润的一层泥土，水灵灵的大白萝卜密密地呈现在眼前。这种最自然的方式，保证萝卜新鲜营养又不受冻。

这是一座见证时代发展趋势的院落。陈大爷和陈大娘以85岁的高龄住在这座老院落里，院落里的一切是他们老人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写照。土地里的和院子里的东西是循环的、淳朴的，院里的一切无不是各种动、植物的生命各阶段的痕迹。老人家85岁了，还在进行适当的劳动，用一辆旧式架子车把东西拉进来、拉出去。老爷爷和老奶奶非常和蔼、慈祥，整个院子里呈现的就是安详、多样、和谐的农家生活。老人家热情、自豪地为每一个介绍每个物件，一切都那么富有情味的生命感、故事感！这是个特别养眼的院子。

然而，紧挨着这座旧院落的，是一家刚盖好两层楼房的现代院落。屋主主人是一位中年人，他积攒了十多万元盖起的。高大的新式防盗门把院内院外绝地地隔开了，农村近些年来流行的那种建筑，八米多高的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楼房，内外贴满了瓷砖的，都是从建材市场买来的物件，没有因倾注自己的爱好而亲自手工制作的东西在里面。一律整齐划一的特点——外部豪华，内部精装，保暖成本很昂贵——使用现代电器，但显得很气派。院里的地面已经用砖全部铺过了，没有一棵树木，没有那么多柴堆儿，更难以调动起我们对多元生命欣然向往的一种憧憬。这是一种乡村格式化的现代建筑发展趋势，院里院外给人的感觉信息很少，只见几眼便全看自己身上所有东西的分类扎堆儿，就是一种显露吧。

老院落，与地理环境大气候相适宜，正在无奈何地衰落下去；新院落，是在农户间攀比之下，与现代化耗能设备的使用相适宜的，正在通过农民的奋斗而迅速地发展上来。

（上接第3版）中所带来的良性循环。我的第一本书《自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版后不久，我们提供资金支持了两个企业社会责任为主的研究中心，一个在天津商业大学，另一个在苏州大学。我们很快看到了这些中心的潜力价值，来不及多想就提供了资金，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将我们的创业基金开发成具有有效的有意义的项目。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我们的付出会带来无以数计的成就和各式各样的回报。

在物质层面，当我们返回高校时，我们受到了象牙王贵族般的款待，同时收到了非常珍贵的礼物，我们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一直处于兴奋中，许多新朋友与我们建立了终身友谊并表达了终身的祝福。

在精神层面，我们收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只

要我们回到中国就会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并提供给我们各式各样所需要的帮助。我们收到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给予的。

本文讨论了两种品质——自我认识和慷慨给予——这是领导要必备的素质，如果想要使他们的组织把所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三家公司政策表明他们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慷慨给予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墨尔本维西公司的回馈方式集中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对社会所做出的经济贡献；金宝汤公司的做法则充分表明领导要关心员工的福利；印度零售商Pantaloon则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他们的员工。所有这些企业获得的各种好处都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慷慨给予。宏伟理想的承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吗？

（上接第1版）深，会同自然世界产生一种在更深的感情层面上的联系。甚至有一个专门术语用于描述那些在工业化富裕国家可能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不能经常接触到的孩子——“自然缺乏症”。尽管有些孩子确实适应了呆在室内，多数时候通过电子设备与世界发生关系，很多孩子也正在遭受其不良后果的影响，从维生素D缺乏免疫系统抑制（多属一种疾病）、再到行为问题如富有侵略性。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地依赖健康的在地、区域、和全球生态系统，保护和再生环境必须成为在最广泛意义上追求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

一个以满足每个人基本的物质和非物质需要为目的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需要一个民主决策过程，它建构在社区内部的合作和多个社区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之上。人们将需要接受一个比现在所谓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节制得多的生活。[考虑到世界银行如下估计：世界上最有钱的20%的人口（约14亿），消耗了约75%的资源（以及相应的污染）。]这大约勾勒出了国与国之间巨大的不平等状况，但在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更加惊人。如《关于资本主义每一

个环保主义者都应该知道的》所述：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既是一个阶级的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在2008年，美国的最低收入群体（最高的20%）和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差距，在住房和服装上相差三到四倍，在交通上相差五倍。在加拿大，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最低收入的10%人群的四倍，而其消费品足迹（consumer goods footprint）最低收入的10%人群的四倍。

当放在全球范围来看，不平等状况更加糟糕。“仅占全世界2%的成年个人拥有全球财富的一半，最富的1%占有全球总财富的40%；而最穷的全球一半的人口仅拥有总财富的1%。”因此，一个和谐的、生态健康的社会必须促进彼此的平等。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所谓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因为以资源的消耗而言，那意味着一个地球无法承受的生态足迹。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和谐社会的必需）也不会容忍极个别个人过着奢侈生活，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却守着低得多的生活水准。因此，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需要平等的条件。实际上，如果包

括投资、工资、私人财产许可类型等经济决定是通过民主的、计划的过程决定的话，怎么可能造成如此贫富悬殊的境况？如果社会是要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以道德而论我们就不能有一个群体，不管如何之小，构成一个富有、悠闲的阶级，提倡一个美国的伟大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显眼的消费”。我们也不能有一个基于“惹人反感的攀比”的“金钱消费”文化，每个人都试图在物质占有上把邻居给比下去。

在不久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从对一些基本生态概念的讨论开始切入到生态文明的主题。我描述了支撑强健生态系统的几个支柱——多样性；通过紧密联结的新陈代谢关系建立的高效的自然循环；自足性；自我约束；以及通过自我更新而得到的韧性。那个讨论接着就转向向以那些支柱为框架去考察一个可能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必要性。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当经济得到控制时（自我约束），可发生的变化会是什么。在委内瑞拉，小户渔民曾经因为大型拖网渔船的破坏性的捕鱼方式而遭到麻烦。拖网捕鱼技术不仅捕获大量的鱼，而且还破坏了未

来维护鱼类生长的河床和珊瑚礁。政府后来禁止了大型拖网渔船在委内瑞拉领海捕鱼。渔业社区被鼓励自己集体决策和共同管理他们的资源。现在，楚奥村（Chuaio）——一个以从可可树上出产高品质巧克力而闻名的村庄——的渔业合作社集体决定于何时、何地、捕捞多少和多大尺寸的鱼。他们不仅能够养活自己的社区，还卖鱼给政府运营的低成本市场以供鱼给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园圃和所捕捞的和所卖的鱼、以及所卖的鱼和香蕉，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种类似自足（支撑强健生态系统的另一个支柱）的经济。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捕鱼的地点、数量和鱼的大小，他们和自然环境处于一种密切联系的清醒意识和有计划的更新陈代谢关系之中（强健生态系统的另一个支柱），这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尊敬和为子孙后代而保存资源的思想。

总而言之，一个和谐的文明要求经济和政治处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社区通过有意义的民主过程努力实现自我约束；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达到自足（但完全的自足也不必要）；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不可过度）的经济平等；有民主；而且将生态的方法应用到生产、

生活和交通运输中。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简化问题：

和谐的文明 = 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在社会控制之下，意味着由人民以民主方式控制工厂、农场和其他工作场所）

+ 一个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注意保护环境经济充分平等

+ 简单生活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培养一个新的、和谐的伦理道德是生态革命的一部分。如《道德经》所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我们必需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找到一条回归这一本质上和谐、生态之路。

欢迎订阅《世界哲学》

《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中央级学术刊物，是国内唯一一家具有50年历史（1956-2006）的外国哲学翻译和研究杂志。《世界哲学》以繁荣学术为主旨，翻译、介绍和评论外国哲学为己任，50年来翻译和介绍了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的思想，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外国发展动向的重要窗口。

2006年1月，《世界哲学》经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定，入选CSSCI来源期刊，并被国内广泛使用的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如科技部开发、维护的万方科技期刊数据库），同时被列为重点学术期刊。目前，《世界哲学》拥有一个有分量的作者和译者群体，同时又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世界哲学》同仁决心将这个刊物办得更加出色，不辜负广大读者对该刊的殷切期望。

值此新春来临之际，《世界哲学》全体同仁向海内外读者问好，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订阅，惠稿本刊。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编辑单位：《世界哲学》编辑部  
主编：李河  
主任：鲁旭东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子邮件：wpcass@163.com; wpcass@sohu.com  
国内刊号：CN 11-4748/B 国际刊号：ISSN 1671-4318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国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想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想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星星之火、步履維艱。

但是如果有一您的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張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國際標準期刊刊號（ISSN）：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N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007 CLAREMONT, CA 91711-8007